

## 編 者 按

本期兩篇論文從不同側面討論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及相關問題。柯偉林 (William C. Kirby) 的文章，觀點新穎，富挑戰性。他認為，1911年龐大清帝國崩潰之後，中國之所以沒有分崩離析，是由於民國歷屆政府自覺地運用促使中國國際化的外交手段，有效維護了疆域和主權完整，並逐步獲得主導外交事務的能力。同時，國際化也深遠影響了中國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。遺憾的是中共建立政權以後沒有繼承這些成果，以致早期在國際上陷於孤立。柯偉林的文章既挑戰近來盛行的強調中國特殊性，即「以中國為中心」的研究方法，認為它不能解釋國際化了的中國近代史；同時也挑戰海峽兩岸學人解釋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兩種對立觀點：要麼講成一部國民政治史，要麼就是一部共產革命史。他認為，北洋、民國、共和國的政府都是「中國的」政權，它們的政策都是「中國」歷史的延續。只有消除意識形態偏見，中國人才可能對中國二十世紀史作出完整的解釋。

今年是首批華工抵達古巴150周年。王冠華特別撰文討論南美華工歷史悲劇的成因。他指出，清王朝在十九世紀遇到的巨大社會危機迫使大量華工出洋謀生，但中國社會對他們普遍存有偏見歧視，而清政府既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，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和外交人才去保護華工，只是奉行所謂最小代價原則。直到古巴、秘魯華工的悲劇引起國際關注時，清政府才派遣欽差赴古巴、秘魯調查並開始保護華僑，但又遲遲未能與華僑建立起一種新型關係。因此，華僑在清末普遍轉向革命，是有其深遠歷史根源的。